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2.008

论古尔纳《最后的礼物》中的 历史想象与重构

李卓^{1,2}

(1.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浙江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的小说《最后的礼物》通过失语症、录音机和难民中心三个象征性元素,深入探讨历史想象与重构主题。失语症象征着主人公阿巴斯因创伤历史造成的记忆压抑与遗忘,反映了移民个体面对创伤时的沉默与封闭;录音机作为历史再现与言说的媒介,构建出西方殖民话语之外的历史空间,使得非洲流散者在言说非洲历史的过程中实现对西方话语的反言说;难民中心揭示了非洲移民在异乡寻求身份认同和连接历史时空的诉求,以及企望通过叙说创伤历史经历实现某种和解。古尔纳巧妙地使用象征手法,旨在展现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和重构过程的多维向度,以便揭示移民个体在面对历史创伤时的心理挣扎与和解祈望。《最后的礼物》不仅是对个人记忆的探索,也是对集体历史的反思,彰显了古尔纳对移民身份认同的历史想象与重构愿景。

关键词: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历史想象;重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2-0057-06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的作品主要关注难民问题、身份认同、种族冲突以及历史书写等主题。其作品多以跨国移民经历为背景,深刻探讨“有色人种及其后代从旅居者转变为公民,最终成为‘合法的英国人’,在这一过程中寻求‘归属感’所经历的困难”^①。古尔纳的作品隐含着作者对跨国难民的深刻感情以及对其身份危机的忧思,展现后殖民时代非洲流散者的生存困境,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小说《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 2011)延续古尔纳早期创作脉络,聚焦流散群体的生存境遇,揭橥移民经历对个体及其后代的深远影响。古尔纳的小说“毫不妥协但充满同情地深入剖析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陷不同文化冲突而与非洲文化产生鸿沟的难民的命运”^②。从研究现状来看,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难民主题、流散叙事、殖民主义、历史书写、身份认同、空间书写、叙事艺术以及创作手法等方面;就历史书写论述而言,已有研究大都关注历史记忆这一问题,而对该小说中的历史想象与重构缺乏深入的挖掘。殊不知,古尔纳本人对流散历史有着独特的表述,认为“一种新的、简化的历史正在构建中,改变甚至抹除实际发生的事件,将其重组,以适应当下的真理。这种新的、简化的历史不仅是胜利者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程”^③。文学对历史的再书写不应“只是被用来逆写帝国、澄清事实真相,而是应展现更多非洲当地的社会范式,让叙事重新回归非洲”^④。古尔纳的言外之意在于历史并非客观、单一的真相,而是多元的、动态的构建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学作为一种叙事工具,能够挑战传统的历史观,展现

收稿日期:2024-10-0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4WWC001);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2456108)

作者简介:李卓(1991—),男,河南南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英语国家文学研究。

①Sean James Bosman. *Rejection of Victimhood in Literature By Abdulrazak Gurnah, Viet Thanh Nguyen, and Luis Alberto Urrea*.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21, p. 36.

②Press release. Nobel Prize Outreach 2025.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1/press-release/>.

③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94页。

④Gurnah, Abdulrazak. *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 Oxford: Heinemann Educational, 1995, p. xi.

被边缘化的声音和视角,揭示非洲当地的社会范式。古尔纳所提倡的文学再书写,正是希望通过重新审视历史,回归到那些被忽视的故事和经验中,从而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更丰富的理解。鉴于此,本文通过小说中呈现出的与非洲历史书写紧密关联的三个象征性元素:失语症、录音机和难民中心,深入探讨历史想象与重构的主题。《最后的礼物》不仅是对个人记忆的探索,也是对集体历史的反思,反映移民身份认同中的历史想象与重构的关键作用,可为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失语症:历史的记忆与遗忘

阿巴斯的失语症是创伤记忆的显性表现,深层次地反映了历史创伤的后遗症。在《最后的礼物》中,古尔纳通过沉默这一独特的叙述手法,生动地揭示了阿巴斯在桑给巴尔作为“夹心人”所面临的窘境,以及他在英国流散时的内心挣扎。沉默不仅是阿巴斯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更是一种对历史的另类书写方式,传达了他对难以面对的过往的掩盖与抗拒。阿巴斯试图通过沉默来逃避痛苦的记忆,但这种无声的抵抗反而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历史记忆的洪流之中。他的失语,成为历史的见证,既是对个人创伤的隐秘表达,也是对集体历史记忆的一种反思与承载。

一方面,主人公阿巴斯的沉默不仅是对压抑的创伤记忆的反应,更是殖民历史在被殖民者身上留下的显性创伤后遗症。阿巴斯出生于前英国殖民地桑给巴尔的小镇温古贾岛,自幼受穆斯林文化熏陶,但随后长达十年的殖民教育却让他不自觉地认可西方文化。相悖的文化观念让阿巴斯陷入“夹心人”的窘境,饱受“震荡与巨大的精神折磨”。与也门妻子莎莉法(Sharifa)的婚姻也加重了阿巴斯的身份危机,导致其逃离家乡,将桑给巴尔的历史经历压抑在心中。然而,压抑的创伤记忆却造成其不幸经历的重复和延宕。如卡鲁斯(Cathy Caruth)所言,“创伤的历史力量不仅在忘记之后这种经验一再重复,而且在其内在的遗忘之中,或通过忘记,这个事件[每一次重复]都像第一次经历。也正是这个内在的实践的潜伏期矛盾性地揭示了历史经历特别的时间结构,即延宕(belatedness)”^①。远赴英国的阿巴斯并没有摆脱“历史包袱”,反而在一次次压抑与遗忘的尝试中,重复经历创伤,最后中风,从主动的缄默到被动的失语,最终无法再用言语表达自己的过去。这不仅是身体上的限制,更是对他过去经历的隐喻。

另一方面,阿巴斯的沉默不仅是历史创伤在个体身上产生的后遗症症候,更直接导致了他的失语症。从桑给巴尔到英国,阿巴斯跨越的是地理和文化的多重边界,迥异的文化环境和断裂的文化经历使得阿巴斯陷入失根困境,在英国强势话语下阿巴斯彻底丢失自己的声音,而阿巴斯的沉默也代表着移民群体在移入国丧失话语权的现象。最初,他至死都不想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②。在英国生活了40年,他依旧认为自己是异乡人,为了不“被人当成是流浪汉”,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凝视的焦虑中。这“其实是他心中的不安,是一个与周遭环境依然格格不入的外乡人的心态”^③。古尔纳虽然没有具体描述阿巴斯受到的歧视,但从他小心翼翼以及时刻戒备的状态可知,阿巴斯从未获得归属感和文化身份认同感。“共同的身份认同是连接个体,缔造集体的重要方式,但共有的身份在产生归属感的同时,也常常引向对于‘非我族类’的排他行为,‘造就对其他族群的疏远和背离’。”^④但阿巴斯在他者规训的目光中沉默,又因背弃故乡和亲人而终日悒悒,成为失语症的受害者。古尔纳通过对阿巴斯由于沉默诱发失语症的刻画,揭示了殖民历史对个人身份和记忆的深远影响。当失语症成为一种表达个人痛苦和历史创伤的方式,读者自然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移民的困境和挣扎。

由此观之,阿巴斯的失语症展现了创伤历史对记忆与遗忘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阿巴斯选择压抑创伤记忆,这一出于自我保护的举动反而让本该淡去的历史创伤变得更为深刻,从而加重了其心理和生理上的障碍,诱发其选择性地遗忘历史。古尔纳不止一次描绘了阿巴斯在记忆和遗忘之间的矛盾,指出他“即使有时一阵薄雾模糊了往事,他依然能察觉到、感知到他的记忆想要回溯的那些时刻有何意

^①Caruth, Cathy.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

^②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③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页。

^④李睿:《〈布鲁克林〉中的流散书写与共同体想象》,《外国语文研究》2023年第6期。

义……哪怕他的内心渴望遗忘”^①。历史创伤的延宕性也体现在阿巴斯对过去经历的片段化记忆中。他的记忆被碎片化,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这种记忆的断裂象征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并且,他的历史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更是一个群体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集体创伤,主要表现为殖民历史对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压迫与抹杀。“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②在殖民历史的背景下,记忆往往是被选择的,某些部分被强调,另一些部分则被压制和遗忘。阿巴斯的记忆碎片象征着被遗忘和忽视的历史片段,提示我们关注那些被压制的声音和记忆。同时,失语症不仅象征记忆的断裂和遗忘,也提示了历史的再现与言说。

二、录音机:历史的再现与言说

阿巴斯通过录音机完成的回忆录,在重塑自我的同时也实现了历史的再现。在言说的过程中,他不断地选择、过滤、重组自己的记忆,使得这些记忆不仅仅是过去的再现,更是对过去的重新审视与诠释。这种重构不仅涉及个人的经历,还涉及集体的历史,特别是殖民历史与移民经历。同时,阿巴斯留下的录音为其子女构建了一个在场空间——录音机所构建的记忆场,让其子女在言说非洲历史的过程中实现对西方话语的反言说,获得了参与历史的主动权,构建了积极的非洲形象,为认同非洲身份并反思英国文化在其身份上留下的踪迹做了铺垫。

首先,阿巴斯通过录音机言说历史记忆,不仅重塑了自我,摆脱了异乡人的虚无感,并在言说过程中产生的虚拟空间中回归故乡,从而在精神上完成了回归的仪式。“创伤痊愈的标志之一,是患者能讲述他们的故事,回顾所发生的一切,使其在自己的人生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③利用录音机这个媒介,阿巴斯在直面过去、治愈创伤的声音空间里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温古贾岛,实现了与过去的和解。同时,阿巴斯在讲述过往的过程中,也用现在的目光去重审历史记忆,再现历史并塑造积极的非洲形象。“记忆还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表现在个人回忆过往的自己时存在着两个自我,即处于现在状态的‘我’回顾或遥观过去的自我,而后者则囿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事件之中。”^④阿巴斯把非洲的历史记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给后代,这份宝贵的“最后的礼物”不仅让阿巴斯重塑自我,也让移民二代摆脱西方强势话语对非洲的刻板印象,在对非洲这一陌生故乡充满希望的同时实现身份定位。

其次,在阿巴斯的录音机所构建的记忆场域中,非洲历史得以具象呈现,为移民二代提供了见证父辈非洲经历的机会,也助力其在此过程中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定位。见证(witness)不仅涉及创伤经历,也涉及创伤讲述的倾听、分享和传递。罗伯(M. D. Dori Laub)认为“见证具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经验之内自身的见证;第二层,对他人证词的见证;第三层,对见证过程本身的见证”^⑤。其中第二层是对他人证词的见证,“第二层次的见证可以是讲述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听者同时也是秘密的分享者,跟随讲述者重新经历创伤事件”^⑥。汉娜与贾马尔通过反复聆听录音机,见证了阿巴斯的创伤记忆,逐渐揭示了阿巴斯沉默的根源。同时,阿巴斯因沉默而产生的身份缺失焦虑也在录音机所构建的记忆空间中得到缓解。通过这种互动,汉娜和贾马尔不仅理解了阿巴斯的痛苦,也在共享的经历中重塑了自己的身份与情感联系。具体而言,汉娜从不了解自己名字的由来而“痛恨汉娜这个名字”^⑦,到决绝地抛弃阿

①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30页。

②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③王欣:《记忆、创伤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50页。

④王欣:《记忆、创伤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45页。

⑤Caruth, Cathy. *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2.

⑥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认为,当某人见证了人们的死亡时,也就是成为一个幸存者的过程,这个见证人对于整个幸存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很快意识到作为幸存者的责任。这种心理涉及从负疚到责任的变化(transformation)。心理分析家和治疗者听取病人讲述,容易形成双重见证(double witness),尤其是在倾听了多年之后,医生开始吸收病人的故事,在自己的脑海里形成他们所说的画面。这种经历同时也是形成或重构自我的过程。具体详情参见:Caruth, Cathy. *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8-143.

⑦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8页。

巴斯起的“汉娜”这个名字并选择用“安娜”(Anna)这一普遍白人女性的名字来宣布与家庭的决裂,表明其对非洲血统的唾弃和对想成为真正的白人女性的渴望。不仅如此,汉娜为了使自己更像英国人,选择与白人男性尼克在一起,但尼克的出轨以及尼克父母居高临下的态度让汉娜顿悟出,她努力抹去黑人人性只是徒劳。在汉娜陷入自我身份的怀疑时,阿巴斯的录音叙事恰好给了她离开尼克并认同自己非洲血统的勇气,使她能够以话语构建言说非洲历史的空间。非洲历史对于移民二代而言不再是一个扁平的形象,而是生动的、有着独特文化以及悠久传统的故乡,作为移民后代的汉娜才得以重构代表自身黑肤色的文化自信。

最后,以录音机展现的声音叙事也为非洲历史获得了话语权,阿巴斯利用录音机——这一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符号,来保留自己的个人历史,象征着非洲话语也能在强势的西方话语中博得喘息之地,能够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自己发声,让移民后代得以在强势的西方话语中重构自己的声音。贾马尔对非洲的印象从模糊到能够寓意言说非洲历史的转变便是最好的例证。与汉娜不同的是,贾马尔主动去学习和了解黑人文化,把欧盟国家的移民动向与政策以及阿巴斯等第一代移民的现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探讨关于非洲的“那些沉默的空白”^①。然而,由于非洲历史的缺席,贾马尔无法真正与黑人文化产生共情,加之阿巴斯的沉默,贾马尔始终和非洲历史隔着一层纱。阿巴斯最终对历史的言说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贾马尔得以用一种想象的方式来弥补自己有关非洲研究的空白。随着他对黑人历史愈发深刻的了解,他愈能理解如同父亲那样的“两栖人”困境。不过认同非洲的贾马尔也并没有否认英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他接受自己是英国黑人身份的事实,在实现对“过去”定位的同时,也积极建构“现在与未来的身份”,作为“跨界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贾马尔如是说道:“我在写一个短篇。又一个父亲的故事。如此缺乏惊喜的移民主题。我打算叫它:《非洲来的猴子!》。”^②

阿巴斯的录音叙事让后代摆脱了身份焦虑,使得个人记忆与经验在被分享的过程中超越了私密性,成为集体共享的记忆,促使移民二代与同为难民的非洲流散者产生共情,发挥认同的心理机制,从而生成对历史想象的归属感。汉娜和贾马尔的身份定位研究表明,汉娜和贾马尔的身份定位研究表明,认同的建构既需要承认他人或群体具有共同诉求与共享特征的基础,又在此认知前提下,通过想象性建构形成具有排他性的身份统一体,并最终生成指向该共同体的忠诚属性。同时,录音机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扮演了记录与再现历史的角色。通过录音机,阿巴斯得以记录自己的回忆,这些回忆不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是关于殖民统治、移民经历以及文化变迁的历史记录。并且,录音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口述历史的局限,使得记忆得以更加真实、详细地保存下来。阿巴斯使用录音机记录下自己的故事,试图将个人经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历史在代际间的断裂。这种记录方式不仅体现了历史的再现,更强调了历史的言说,即如何通过言语来构建与诠释历史。

三、难民中心:历史的见证与重构

在《最后的礼物》中,难民中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承载着记忆与历史重构的象征。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在历史和回忆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这是两种过去——历史所书写的过去与回忆所呈现的过去——之间的“灰色地带”:“前一种过去是科学的可靠的报告,它面临各种冷峻的检验;而后一种过去则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部分或背景。”^③换言之,历史与回忆之间存在的“灰色地带”表明过去的叙述不仅仅依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也植根于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情感。难民中心作为这一过程的具象化,成为一个交汇点。在这里,移民们的故事得以交流与分享,彼此的经历和记忆交织在一起,共同见证并重构历史,显示个体如何在集体记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难民中心不仅仅是移民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展望,他们在历史与回忆的交织中不断重塑,寻找着新的认同与归属。

^①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89页。

^②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86页。

^③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李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在记忆的建构中,历史被保存下来,并通过个人与集体的互动和分享,得以重构和见证。在难民中心,玛利亚姆借助移民的帮助,促成了个人创伤记忆与集体创伤记忆的融合,从而获得了直面历史的力量,实现了与过去的和解。玛利亚姆回顾个人创伤的过程,其实是在通过个人视角审视与她的民族背景、移民经验密切相关的历史。可以说,在诺里奇难民中心的身份认同过程中,玛利亚姆与过去的互动是历史被见证和重构的关键。难民中心不仅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亲人追踪,还协助安置,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够重建记忆、恢复身份的空间。玛利亚姆渴望参与其中,觉得这就像是加入“家族企业”^①。她意识到,要在多元文化的英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首先必须找回自己过去的历史和身份。她决定回到那个曾让她逃离四十余年的故乡,面对那些曾带给她创伤的人和事,试图通过解开身份之谜来实现自我和解。最终,她与养父母的和解成为一种“痛苦的愉悦,仿佛是在见证一个未完成仪式的圆满”^②,这种和解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疗愈,更是对集体历史与创伤的一次重建和见证。族裔身份的认同成为她积极抗争的力量源泉,在此过程中,玛利亚姆通过与他人分享和见证集体历史,重构了自己的身份,并将这种认同感转化为行动的动力。她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也让她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重构者,更通过亲自面对过去创伤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创造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共同历史。

从对难民中心的书写可以看出,古尔纳对历史的想象是一种集体的、共同的经历,而不是一系列孤立的个人叙述。他对难民中心和多民族舞台剧的描绘,证明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叙述,而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涉及多种声音和视角。难民中心是古尔纳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的一个缩影——一个包容的空间,不同的民族群体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创伤,并通过他们的集体参与,积极地构建归属感和共存的新叙事。从这个意义上看,难民中心的书写映射出古尔纳的创作信念:即后殖民历史的潜力不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力量改写,而是通过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的共同经历和声音改写。因此,古尔纳对历史的重建并不局限于个人的创伤,它延伸到记忆和治愈的集体过程。正如劳伯所言:“见证创伤事实上是一个包含了倾听者的过程。为了使见证的过程发声,需要一个情感的链接,在倾听者的位置上需要他人亲密又完全投入的在场。”^③古尔纳《最后的礼物》的叙事结构反映了这种动态过程,他描绘了一段共同创造的历史,一种共同的见证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多个民族不仅讲述了他们的过去,还参与了历史重建。由难民中心的人们编写的舞台剧本身就体现了这种共同重新想象历史的想法。“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突然之间全部用索马里语唱起了一首喧闹欢快的歌谣”^④的场景成为团结和相互理解的表达,将创伤空间转变为集体跨文化参与的场所。可以看出,古尔纳表明历史和创伤从来都不是静态的,他们不断地通过他人的情感和身体存在进行重塑与诠释。这与古尔纳的多民族社会理念密切相关,在多民族社会中,历史创伤不仅得到承认,而且以共享、包容的方式被积极重构和书写。因此,古尔纳的历史想象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历史,提供了一个历史在不断重构的愿景,从而为各民族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提供可能。

此外,《最后的礼物》展现了古尔纳对移民融入所接纳的国家社会的期待,以及对共同书写历史的想象。古尔纳对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的融合体现了创伤经历与历史的互文性,历史创伤的积极潜势以另类的方式呈现出来。然而,这种通过集体分享来治愈个人创伤的历史重建仍局限于个人经验和创伤的情感共鸣范围。正如卡鲁斯指出:“历史和创伤从来不是个人单独的经历;历史是我们解释彼此创伤的方式和过程。”^⑤然而,古尔纳的作品往往倾向于关注个人的创伤,而不是展开更广泛的历史叙述。虽然集体表演提供了一种治愈和集体历史书写的感觉,但古尔纳的历史想象力最终局限于个人和情感的历史重建。古尔纳通过个人视角关注创伤和流离失所的个人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塑造这些经历

①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11 页。

②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79 页。

③Felman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70.

④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77 页。

⑤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5.

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难民的历史,虽然在个人层面上深刻动人,但往往存在于更大的权力体系、殖民影响和地缘政治斗争中。难民中心上演的舞台剧,虽然描绘了文化团结和文化身份认同的时刻,但也体现古尔纳在历史重建中的局限,即这一时刻没有涉及支撑难民经历的更深层次、更系统的问题。这种选择性的历史事件忽略了塑造个人故事的复杂的、集体的历史叙述。

结语

古尔纳在《最后的礼物》中通过失语症、录音机和难民中心三个意象映射了个体经历对历史的承载与反应,这种历史的呈现也引发了对殖民历史的反思。读者可以看到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伤害,以及这种伤害在几代人身上的延续,促使人们思考如何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以及如何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尊重和理解。同时,该小说也点破了个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挣扎,呈现了后殖民时期移民群体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反映历史遗留的种族和文化隔阂对个体生活的影响。古尔纳通过录音机传承历史的功能,表明移民群体可以利用西方科技抗衡西方话语,保留自己的声音;而玛利亚姆及其子女在难民中心共享经历、疗愈创伤的行为表明移民群体在对历史的想象与重构中实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小说通过阿巴斯及其家人的经历,揭示了历史不仅仅是宏观的社会变革,也包括个体和家庭层面的记忆与变迁。家族的兴衰、迁徙、文化传承等都是社会历史的微观体现,历史不仅是一种记忆的保存,更是通过重构和想象达成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共鸣的基础,它们共同构成一幅丰富而多元的画卷。古尔纳笔下的难民书写及其身份建构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主流话语,难免有失偏颇。在其殖民历史的反思中仍需要从还原历史真相的角度审视西方殖民扩张给人类造成的戕害及其反人性因素。离开这一历史维度,任何“创伤叙事”“后记忆书写”的讨论都免不了陷入套用概念批评的俗套,很容易滋生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观。

Reading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Gurnah's *The Last Gift*

LI Zhuo^{1,2}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bdulrazak Gurnah's novel *The Last Gift* delves into the themes of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y way of handling three symbolic elements: aphasia, tape machine, and refugee center. Aphasia symbolizes the protagonist Abbas's depression and memory loss caused by traumatic history, reflecting the silence and closure experienced by immigrants in the face of trauma. The tape machine, as a medium for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speech, creates a space for historical narrative outside the confines of Western colonial discourse, allowing the African diaspora to articulate a counter-narrative in response to Western history. The refugee center represents African migrants'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a historical construct of time and space in a foreign land in the hope of reaching reconciliation that may derive from their deep reflections on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 of shared traumatic history. Gurnah skillfully employs these symbols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multi-layered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highlighting the psychological struggles and reconciliation efforts of individual immigrants confronting historical trauma. *The Last Gift* is not only an exploration of personal memory but also a meditation on a collective experience of history, underscoring Gurnah'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immigrant identity and his vision for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Gurnah; *The Last Gift*; historical imagination; reconstruction

(责任校对 唐尧)